

走向多样化格局的澳门小说创作

朱双一

摘要:为数不多的澳门作家和作品,却呈现了比较丰富的创作样貌。首先,澳门小说呈现了澳门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其次,在这多元景观中,仍有个主导的品格——保守温和、宽厚包容。部分资深作家近年来不断力求创新,促进了澳门小说创作的多样化。新锐作者在题材和技巧方面的诸多新尝试,最终构成澳门小说的多样化格局。

关键词:多样化格局;澳门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1)1-0005-05

与中国大陆、台湾乃至香港等地区相比,澳门小说创作在量上并不算多,但衡量一个地区华文文学创作的价值,除了“量”外,更主要的要看它是否为华文文学提供了新的东西——新的题材,新的角度,或者新的技巧,等等。即使量少,但只要贡献了新鲜的文学经验,澳门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与此同时,澳门的小说作者大都有其独特的创作个性,并不像其他地区,常有一些作家相互摹仿,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小说作品也并不陈陈相因,而是采用了丰富多彩的创作手段和技巧,呈现了各自不同的创作特色。如果说以前的澳门小说创作,主要仍以写实手段为主的话,那近一二十年来,则出现了日益多样化的创作局面。为数不多的澳门作家和作品,却呈现了比较丰富的创作样貌,这或许与澳门的四方杂处、多元并存的文化特征,有着直接的关系。

—

澳门小说呈现了澳门特有的社会风情和文化特质,为其他华文小说所无法替代。

首先,澳门小说呈现了澳门文化的多元性特征。从横的方面看,中国的和西方的、现代的和传统的各种文化并列共存。正如程文超所

言:“在澳门,你被推到了各种文化的交汇点上。当你走过大三巴牌坊时,你聆听着上帝的声音;当你路过葡京大酒店时,你面对着世俗的享乐……于是,你能观照、体验着各种人生……在澳门这样一个小城,如此集中地享受到中外雅俗各种不同的文化、如此强烈地体验到甜酸苦辣各种不同的人生,古今中外都属罕见。”许多小说对此也直接加以描述。廖子馨在《命运——澳门故事》中写道:“澳门真是个有趣的地方。这样一个国际都市,既有商业气息,又有浓郁的乡土味道;这样一个中国人的地方,却充满异国风情……真说不清小城的特别。”

从纵的方面看,澳门历史悠久,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族群带着各自的历史记忆,共同生活于这个城市中,有所区别而又相互交集,体验世道沧桑,人生的喜怒哀乐、兴衰起伏,构成复杂多元的情景。邹家礼《乌夜啼》采用双线穿插结构,一条线写祖辈的历史故事,一条线写孙辈的现实故事,并通过血脉关系使两个故事获得交集,呈现历史的深度。小说描写的两代中国人和葡人的爱恨情仇,呈现了澳门基于历史根源的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其次,在这多元景观中,仍有个主导的品格——保守温和、宽厚包容。澳门可说是个略见保守、温和的现代国际都市,虽已臻“现代”,但与

香港的奢华相比,它显得较为淳朴、稳健。廖子馨曾对澳门这一文化特征的成因有过分析:“澳门社会具有四百多年的殖民地历史,葡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建家立业,并且,把葡国文化中保守的基因种植在这座半岛上,与华人社会中的儒家文化相融汇,所以,在文化意识方面,澳门欠缺主动性,在文化冲击中比较被动的接收外来文化。”(廖子馨:《澳门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这种保守性,使澳门能够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中,仍保持着较多的传统道德和文化。而这种保持,自然有好的也有坏的一面。

林中英的中篇小说《爱的梦魇》中42岁尚未结婚的“老姑婆”黄雅平,在婚姻上曲折不顺。这样的故事本不稀奇,但作者写出某种澳门特有的文化氛围,值得玩味。一方面是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工商社会正在发展,另一方面,文化气氛仍属比较保守。如果在美国或香港,女子独身并不会引人侧目,但在澳门,一位40岁的“老处女”,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人们异样的眼光,争吵时被取笑为“老姑婆”,与女友同住时被疑为同性恋,等等。雅平所受的压力和最终失败的遭遇,正透露出澳门文化的某种特质。

与澳门的保守性相辅相成的,是澳门的宽厚和包容。余润霖的得奖作品《澳门九景》是写一对内地青年男女先后偷渡来到澳门,相依为命,既为宽厚包容的澳门所接受,更靠自己的本分和勤劳建家立业的故事。小说主角阿文对澳门的这种文化特质颇有感受:“人说这里是莲花地,从来没有大灾祸。加上几百年欧式官治,中西交汇,风物敦化,人情温暖。有点像小国寡民。没有城市人恃财傲物,但有其精明达理。没有乡下人的愚昧保守,但有其温馨淳朴。”几十年后,阿文回顾他的人生历程时称:“只因为澳门的宽容,像我这样的丑老头,没有被赶尽杀绝,确是一景。”他的朋友肥朱也称:“我认为真正五十年不变的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其三,诚如程文超所言:文化,从一定角度讲,是对人生的领悟,不同的文化背后,是不

同的人生领悟,也展示着不同的人生方式。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他或她享受着这种文化的给予、领悟着这种文化对人生的领悟,也按照这种文化所认可的人生方式过着自己的人生。如果说文化即是人们对“人生”的领悟及他们的人生方式,那澳门主导的人生倾向、人生态度,是务实、向善,并不特别追求纯理想性的东西,而是更现实一点,寻找踏踏实实的人生,追求自由自在的个性生活,虽然未必有获得权势钱财的很多机会,但显得安定安逸,认同人生不必十全十美,因此知足常乐,于是“宽容”、“原谅”成为一个常见的主题。这一点,也是澳门文学和其它地区华文文学的显著区别之一。

廖子馨的《命运——澳门故事》,写的是江南一个山灵水秀的小镇的姑娘沈巧,怀抱着到外面的世界见世面的真切愿望来到了澳门,但初到时工作、生活条件的不如意,使她深感失望。身为普通公务员、体型略胖的澳门青年阿伟对沈巧一见钟情,不断给沈巧予关怀。沈巧终于与阿伟步入婚姻注册处。作者的妙处在于能不动声色地将阿伟写得庸俗平凡。周桐称:“人生的真谛本不尽完美,充满缺憾和遗憾,在人生的抉择路途中,我们往往只能作次好而非最好的选择。廖子馨道出了她对人生的体味。”(周桐:《评说小说奖》,《澳门笔汇》12)

也许不是巧合,在已举办的前三届澳门文学奖获奖作品中,表达类似人生感悟的还有不少,如吕志鹏的《在迷失国度下被遗忘了的自白录》、周丽娟的《雪的回归》。这两篇作品题材虽不同,但却有相似的主旨:主人公深感生活的平凡和平淡,力图突破固有“规矩”的束缚,追求自己具有独立个性或“激情”的生活,然而最后又都归于平凡。之所以出现比较多的这类作品,或许因为澳门的文化氛围本来比较保守、平淡,缺乏“激情”和激动人心的变化或大事件。然而,这些小说的最后,出格的举动或者造成悲剧,或者为岁月所磨平棱角,复归于平淡、安稳。这又何尝不说明了澳门的不会轻易变异的主导文化性格?

此外,《流金岁月》可说是一个直接描写容忍缺陷、原谅过失,追求踏实人生的故事。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都是在极端寂寞、孤单的特殊环境中,产生了与对方相互慰藉、相濡以沫的感情。其实两人都有缺陷,并不完美。经过诸多风风雨雨,女主角达到了对人生的深刻认识:“生活就是这样子,波涛汹涌的日子,总是少数,更多的时候,是平静无波”,“恋爱是恋爱,生活是生活。或许正如鲁迅所说:‘人必先生活着,爱才有附丽’。”

和台湾同类题材相比,台湾作品常是男女一见钟情,而后是讲不清理由的爱,甚至明知他要变心,也心甘情愿地陪他一段;有的却是通过男女三角、多角关系,揭示在商业社会中爱情的扭曲,充斥着感情的背叛、灵魂的出卖;或以女性主义角度刻划男女关系,袒露私密性的欲情心理,等等。而澳门的作品却多写务实的人生态度,充满了现实生活的感悟和智慧。而这,同样是澳门特有的文化。

其四,近来澳门小说不断出现针对当局、黑社会、社会治安等方面问题和弊端的揭露,堪称题材的新拓展,不仅反映出澳门特点,而且是小说题材多样化的一个表现。

二

澳门的部分资深作家近年来不断力求创新,促进了澳门小说创作的多样化。

鲁茂的《白狼》中出现土生身份人物和“北地胭脂”,被称为“开垦了小说创作领域里的一块处女地”;而小说对“问题青少年”和黑社会势力的描写,也可说是题材的开拓。根据编辑的披露,作者的原始构思还包含着对当局司法人员徇私舞弊行径的揭露,后虽受制于现实环境而修改了原来的构思,但说明这一题材已开始进入作家的视野,或者预示着具有较强批判性的作品即将萌生。

陶里早期小说属写实主义范畴,近十多年来却致力于“魔幻写实”小说的创作。陶里自述其创作动机:“现实里有许多悬疑,许多空白,一点也不虚假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存在于我们

的心中,成为无法解开的结。笔者虚构的故事,任情节再复杂,任题材的覆盖面再广再大,其实只是现实的小缩影,其本质只及现实的万分之一。”(陶里《百慕他的诱惑·序》)其《鸚鵡》等极短篇虽有现实投影,但其扭曲变形的形象、超现实的情节设计,耐人寻思也令人费解。《屠狗家族》、《石卵之恋》、《万安达夫妇的遭遇》等短篇小说,作者称它们由“迷惘的色彩淡化而为悬疑和空白,作品让读者思考,但答案不一定一致”。它们或许才属于比较严格意义的魔幻写实作品,因它们是对客观存在于某一国度、地区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现实的发现,反映出该地人们心目中真实的然而却是神奇的事物。

陶里的这类创作显然具有创新性,为澳门小说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影响所及,澳门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类似的作品。在台湾,“后设小说”流行一时,年轻作者争相仿效、尝试;而在澳门,却是这类“魔幻”作品较为多见。这应与陶里的示范有关。

周桐像一般女作家一样,小说题材大多围绕婚姻和家庭,但其故事往往错综复杂,常有变幻诡异、出人意表的情节。李鹏翥称她“以特有的女性敏感,将微妙的两性爱情的心理,错综复杂地表现出来。许多时奇峰突出,许多时惊世骇俗,令读者常有文艺心理学中谈到的陌生化效应,保持期待的张力,不知不觉地随着小说主人公的命运和遭折悬念,哀痛、叹息,承受着感情的狂风雨暴的袭击,其中不乏甜蜜和欢乐,最后令读者感受到乐观的希望”(李鹏翥:《人生·爱情·即食文化(代序)》)。这一特点在《错爱》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然而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周桐近年来出色的创新表现。《香农星传奇》的生态保护主题,对澳门小说而言,是一个新开拓。这部长篇使作者走出“写实”的传统套路,开辟了科幻小说的新天地。作者有意以当前、即时的现实事物、事件如中国的改革开放、西部河源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甚至西昌的卫星发射等为背景和情节的链环,虽是科幻小说,但读来显得格外的“真”;而这种格外“真实”的感觉,无疑增加了读

者的切身危机感,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现实批判性,能够给予读者极大的震撼和警觉。这不能不说是这部小说极有创新性的特点。

周桐的创新还不仅在于科幻小说。《楮山盟》被作者自称为“故事新编”。所谓“故事”,即当代日本作家深泽七郎的《楮山节考》(大陆似乎翻译为《酋山小调考》)。周桐将此故事“新编”,却几乎扭转了原有的主题——原来写的是偏僻山区的贫穷以及极度贫困中人性的扭曲,现在却是写由于世界性的人口过度膨胀所造成的畸形社会状态。

如果说原作的缓慢沉滞的气氛和节奏符合于贫困的偏僻山区,那周桐“新编”之作中的烈火般的激情和匪夷所思的诡异情境,则使作品充满了现代感。而这种现代感和来自原作某些因素(如酋山祭民俗)的古拙气氛形成艺术的张力。此外,作者将小说的时空设置于大约半个世纪后的未来,使作品略带科幻色彩。这一切,使周桐的作品比原作更富艺术魅力,是“故事新编”的一个好范例,也为澳门文学开创了一条小说写作的新路。

三

一批年轻新锐作者在题材和技巧方面的诸多新尝试,最终构成澳门小说的多样化格局。

澳门的小说作者,大多能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各自对“叙述观点”精心设计,从而使小说的叙述观点显得灵活多样。如吕志鹏《在迷失国度下被遗忘了的自白录》,以处于三角关系中三位人物的日记的方式,叙述三人共同经历的事情。对同一件事,三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和想法,使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十分细腻,使读者能深入了解人物行为的动机。何爱萍《流金岁月》则采用上半部分以男主角为第一人称叙述者,下半部分则改为以女主角为叙述者,而前半部分正是男主角情真意切、陷入热恋之时,而下半部分则是女主角感情转向强烈之日。作者让他们在感情热烈之时担任第一人称叙述者,自然能使起伏震荡的内心世界及伴随着感情而进行人生思索和感悟得到很好的表达。

新锐的小说作者对于魔幻、后设等新颖小说技巧和形式的实验,比资深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毛顺好的《“鸣玉楼”结业》借用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人物韦小宝等,进行“故事新编”,借古讽今。由于“故事”及相关人物为中国读者所耳熟能详,因此更能讨喜。也许是陶里的影响所致,澳门的“魔幻写实”作品颇多。像钟玉萍的《八色彩虹》、褐广瑜的《寻猫记》等,均属此类。这类小说往往没有情节主线,像是一些片段的“拼贴”,缺少“章法”,但或者也正是当前现实的折射。

在实验小说作者行列中,最值得注意的有梯亚、寂然等。梯亚既有陶里式的“荒诞小品”,又有设计精妙、独创一格的后设小说。

梯亚的《第八天的早晨》是和陶里先生的《百慕他的诱惑》集子中的小说相似的魔幻写实作品。《第八天的早晨》指的是创世纪后的第八天,小说中的情景刚好都和真实的世界相反,如太阳从西边升起,早晨时,人们下班回家休息……让人联想到并怀疑是否上帝“创世纪”时,一不小心,将一切都弄反了,或者同时造成了一个镜子般的“反宇宙”。《陶渊明研究》则是一篇以学术论文的格式写成的小说,有《引言》、论证、以及附录,甚至还有“注释”。小说的主体是对“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一典故作出新的解释并加以论证。表达仍是突破、颠覆固有历史书写的努力。这篇小说实可作为后设小说读之。《论一个关于命运(或者自杀)的格言》则在正文的旁边留出空白,用于附录读者与作者点评式的对话。这些对话有的颇为耐人寻味——读者问道:“怎么老不见女人说话?”作者答道:“女人还在哭嘛!不过,如你要听那女人说话,那就让她说好了。”说明小说中人物的行为动作,其实只不过是作者虚构的而已。这样的设计是富有创意的,在后设小说曾经风行一时的台湾,也未曾见过。它的功能在于导引读者的介入,并提醒小说的虚构性。

与梯亚相比,寂然的实验是多方面、多角度的,而且具有更深沉和丰富的内涵。就小说形式和内容的不断翻新、奇招迭出而言,或者可称之

为“澳门的张大春”。他的小说(如《夜黑风高》系列、《抚摸》、《岛屿的语言》等)常有复杂的多重主题,既有质疑媒体真实性的后设旨趣,又有通过包括“同性恋”在内的各类题材对人性的深刻发掘,更有对社会治安、黑帮势力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揭露,显示作者的勇气。

林玉凤在《寂然小说叙事角度浅论》一文中指出:“寂然在叙述舒飞(《夜黑风高》中的人物——引者按)等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叙述着一个小说作者在创作小说的故事。故事中的小说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想到了和小说有关的种种问题”。这“种种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作者想要说的,主要是什么?结论也许是吊诡的。作者一方面告诉人家(或者说通过自己创作过程的披露)小说不过是虚构的,有许多环节是虚假的,另一方面,作者又运用一些手段,如在小说中有一些近乎“纪实”的细节(如小说提到的《没人写信给上校》就确有其书,为台湾作家张大春的作品),让人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真实,并利用人们对于“白纸黑字”的信任感,让人相信他所说的为真。读者经过这样的真真假假、满头雾水的经历(同时也是一种思考),当能体会到语言,或者说叙述的困难和陷阱。“困难”在于,其实人的言语、作家的叙述,很难穷尽事物的真相,常会因为言不及义、记忆错误、真相难明甚至有意隐瞒、虚构等原因,使所叙述的和真相产生差距;另一方面,所谓“陷阱”则指人们对习惯性或权威性的语言,如官方语言、新闻报导语言,甚至小说家的一些貌似“纪实”的语言和情节、细节设计,很容易地就信以为真,从而受到误导和损害。作家创作“后设小说”的目的,或者就在提醒人们,用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警觉的目光,来看待现在各种媒体上铺天盖地而来的资讯,不要一味地轻信盲从,避免受到误导和伤害。

李若岚对“后设小说”有个颇为扼要的介绍:“后设小说的实验,起源于对世界意义的多

元性和复杂性的探索,但后设小说一方面执迷于小说固有的形象性和虚构给人带来的快感,另一方面,它又不满于传统小说那种杜撰得天衣无缝的、充满了‘诗意’的故事。因为它认定小说的虚构本质,并由此引伸出对建立在人类记忆基础上的历史、宗教等文献的怀疑。”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然而作家的目标绝不仅仅在语言等媒体上,他们更要把目光投向现实。正如有人给“后设”下了这样的定义:“后设是赋予虚构性创作的一个术语,这些创作在有自我意识地和系统地把注意力引向作为它艺术事实的地位,以便于就虚构与现实的关系提出询问。为了对其自身的结构方法提出评论,这些作品不仅要检验叙事小说的基本结构,而且要探索文学虚构作品之外的世界所可能具有的虚构性。”寂然的新作《岛屿的语言》,其实正是通过对“语言”——一些词汇的意义的追寻,来说明作品之外的世界——也就是现实的世界所存在的虚构性。因此这篇《岛屿的语言》和寂然的许多作品一样,是复杂的多主题的——既是对媒体的真实性的质疑,更是对澳门治安、黑社会等问题的反映。

最后须指出,这些年轻作者的新颖创作,标志着澳门的小说创作已能与其它地区(如港台和中国大陆)的华文小说创作同步发展;但同时,它们也还保持着作为澳门文学的独特个性。比如,即使是采用了“后设”、“魔幻写实”等前卫性、实验性技巧的创作,并不像有些台湾的同类作品那样,令人不知所云,而是常有着写实的基调。像梁淑琪的《距离》,甚至采用写实小说的形式,来表达了一些“后设小说”所要表达的理念。这是颇为新颖独特的。这或许是澳门那比较踏实、稳健的文化风格所致。也正是这种独特个性,使澳门小说在世界华文文学中,始终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朱双一,男,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员